



中国青年的世代

与

第六代青年的诞生

袁贵礼

摘要：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诞生以后，其世代传承至今已经是第六代。第六代青年在世纪之交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被计划出生的一代”、“现代化门槛上的一代”。市场经济的强劲发轫、互联网的迅速普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加入WTO、计划生育政策、高等教育急速实现大众化，使这一代青年的人生面临着十分独特的矛盾，并由此获得了诸多新的明显不同于第五代青年的社会特质。

关键词：第六代青年；青年世代；80后青年；90后青年；社会环境；公共政策

要认识某个时代的青年，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是必不可少的维度，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面对青年的思想变迁问题，而青年的思想特点及其变迁是以世代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所以，世代是观察和把握青年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一、中国青年的世代传承

世代的分际“主要地并不在于年龄上的特征，而在于他们的社会特质，即一代人所共有的社会性特征。或者说，使一代人真正成为一代人的，主要的不是由于他们的共时性，而是他们的共有性；代的差异也主要不是年龄的差异，而是其社会性差异”^[1]。显然，这里的“代”与生物遗传学以及人类繁衍意义上的“代”有着重大区别，它指的是一种饱含多种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某个群体之所以会出现“代”的分际，是因为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时代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不同世代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也可以概括为精神光谱上的差异。有的人在年龄上看应该属于上一代人，但在跨越代际转换的时点后，他们能够较快地随着时代的变迁，使自己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特

征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而具有新一代人的基本特质，这就是“跨代”现象；而有的人虽然从年龄上看，完全可以属于新一代，但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却仍然长期停留在上一代，这就是“滞代”现象。

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范畴，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教育的产物。洋务运动、清末的留学潮以及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为现代中国青年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黄花岗起义标志“青年的萌芽”，新文化运动标志“青年的诞生”。从此，中国青年与自己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伴随历史的脚步演绎着世代更替。

第一代青年就是生活在辛亥革命至“一二·九”运动前夜的青年。这个时期的青年刚刚脱离帝制的统治，其精神世界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崇尚“德先生”、“赛先生”，思想启蒙逐步深入，主旋律是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虽然不同的青年因为分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而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共同的特点是都受到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较大影响，所以可以称第一代青年为“启蒙的一代”、“五四青年”。

第二代青年在“一二·九”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谢幕。这一时期国家几乎都



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但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救国救民、民族独立、民族自强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也必然是战争岁月里的第二代青年最核心的精神诉求，所以他们被称为“抗战青年”、“一二·九青年”。

第三代青年的“生命史”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终于“文化大革命”前夜。这一时期人民群众面临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青年们以空前的积极性投入生产劳动、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中去。如果观察其精神世界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在思想上洗去在旧社会沾染的尘埃，统一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他们是“洗旧染新的一代”、“统一思想的一代”。

第四代青年是极为特殊的一代，他们随着“五·一六通知”的问世戏剧性地登场，他们的青春与“文化大革命”共舞，遭到十年浩劫的冲击，1977年8月，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这也意味着第四代青年“生命史”的终结。这一代青年的命运与“高校停招”、“红卫兵运动”、“造反”、“上山下乡”等紧密相连，深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极“左”思想的影响，他们是“思想畸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

1977年8月，随着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随后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中国青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意味着第五代青年正式登场，直至世纪之交第五代青年才悄悄离场。这20余年的时间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实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而且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随即拉开序幕，真正驶入奔向现代化的航程。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市场经济被人们从观念上逐步接受，并在人们的积极探索中取得初步成效。观察这一时期的青年很容易发现，其行为特征已经实现了从“革命青年”到“求知青年”、“置业青年”的转换。观其精神光谱，可以发现他们从苦闷彷徨中渐渐走出，逐步摆脱极“左”思潮的禁锢，并高度认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之，第五代青年是从“文革”噩梦以及极“左”思想制造的乌托邦中“苏醒的一代”，是初步具备了现代意识的一代，因而也是“回归理性的一代”。

世纪之交，随着大批“被计划出生”的孩子进入青年期，第六代青年粉墨登场，第五代青年退出历史

舞台。在这个很短的时段内，发生了对于中国青年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件大事：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摒弃；其二，互联网迅速普及，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其三，中国正式加入WTO，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四，中共十五大在经济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五，中国高等学校开始大发展、大扩招，迅速实现大众化。这意味着此时的青年所处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他们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变迁已经发生，由此他们将获得诸多新的明显不同于第五代青年的社会特质，从而成为下一个世代的青年——第六代青年。

二、蕴育第六代青年的社会环境

在新千年的门槛处，人们从周围青年那里强烈地感觉到，“互联网一代”来了，“网游控”来了，“高消费一族”来了；“性开放一族”来了；“试婚族”来了，“小皇帝”长大了等等，从此“80后”、“90后”成为他们的代名词。当时人们只是从感性上意识到这一代青年确实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实际上这意味着第六代青年已经赫然“杀出”。理性看待这些现象，就会认识到这一批“新新人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经济强劲发轫的效应

上世纪末，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见雏形，这种经济体制上的革命性飞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对全体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强烈震撼。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是利益驱动，基本特征是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的兴起必然产生“双刃剑”效应，在激发人们养成开拓进取、自立自主、勇于竞争、民主平等积极品质的同时，也会激发人们走向金钱至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消极方向。总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国人在思想观念上彻底清除了乌托邦残余，走向了世俗化常态。但这种世俗化过程对此时的青年而言具有特殊意味。青年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期，没有旧的思想窠臼，可塑性强，而且先锋性特征明显，接受新生事物迅速，所以与市场经济相应的种种世俗化的思想观念比较容易地形成了，不像中老年人那样还要经历一番“换脑筋”与“解放思想”的精



神挣扎的曲折过程。

市场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极大活力，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发挥，创业热情得到充分释放。虽然市场经济营造的巨大舞台在一般意义上讲是面向所有人，但对于处在个人事业初创期、没有事业基础的青年而言却有着不同的意义。首先，青年会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其次，在事业上选择的机会更多、空间更大；再次，开创个人事业的过程更复杂。对于多数青年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事业初创期意味着更大的人生磨砺，更多的人生考验，更多彩的人生图景。另外，由于没有中老年人对计划经济时代个人事业逼仄、简单的深刻记忆，此时的青年也就不会产生职业生涯中的强烈震荡感和不适感。总之，青春期与市场经济发轫期重合是第六代青年的特殊际遇，他们也必然因此而高唱与前辈青年曲调迥异的青春之歌，进而凸显自己在青年世代中的独特性。

2. 互联网快速普及的效应

1997年10月31日首次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由此中国迎来了互联网时代，此后互联网井喷式急速发展，网民数从当时的63万发展到如今的5.91亿（2013年6月）。要特别强调的是，历次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均显示，35岁以下的青年是中国网民的绝对主体。互联网的普及对中国青年具有全方位、划时代的意义，使青年们的成长、发展跃上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平台，从而使其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质变，使他们迅速进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并成为全新的自己。如果说互联网改变了中国，那么它首先改变的是中国青年。

首先，互联网使当代青年社会化的过程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互联网提供了极具魅力的交往方式、娱乐方式、学习方式、消费方式和工作方式，青年们处于网络化生存状态，于是他们的社会化环境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强烈的虚拟化特征。网络虚拟社区具有平等性、自由性、丰富性、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等优势，但也具有欺骗性、芜杂性、失范性等劣势，这对于青年社会化显然具有“双刃剑”效应。由于网络对青年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使父辈、老师、传统媒体的权威性遇到挑战，这又意味着家庭、学校、传统媒体在青年社会化方面的功能弱化，势必使青年的“社会化方向控制难度增加”^[2]。社会化过程发生的这些重大改变，必然在当代青年的人格特征、精神光谱中打上

鲜明的烙印。

其次，互联网使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形态发生重大改变。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不仅使传统产业得到全面升级和改造，而且催生了如网络经济等一批规模巨大的新型产业；不仅提供了技术创新的广阔平台，而且激发了人们无穷的创新动力；不仅为经济全球化插上了坚硬的翅膀，而且为经济全球化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不仅大幅度提升了经济的规模，而且革命性地优化了经济的结构和效益。这必然使当代青年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平台更多、方式更多并更具优势，同时为青年的创新、创业提供了巨大需求、广阔空间和众多机遇。从政治角度来看，互联网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而且拓展了政治活动的空间；不仅推动了政治规则的嬗变，而且提高了政治发展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方式、渠道、广度和深度都会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的突出之处在于，使青年的政治参与具备了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具备的特征——网络政治参与到了第六代青年才成为现实，这是他们与上一代青年代际分野的又一个重要标记。

3. 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效应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并在次年写入宪法，宣告中国迎来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春天。这一改革成果对青年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多样化，使市场经济更具有实质意义，不仅优化了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而且使市场竞争更加充分，从而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趋于成熟，城乡分割状态逐步被瓦解。这为农村青年大规模进入城镇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农村劳动力数量从1997年的3890万迅速增加到2004年1.03亿”^[4]。第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为青年的自主创业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策、法律环境，大批青年的创业梦得以实现。《全球创业观念中国报告》显示，中国的创业指数2002年为12.3%，2005年为13.7%，表明中国早期创业活动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5]。“青年作为创业的骨干力量包括青年知识分子、流动中的农村青年、大学毕业生、留学归国青年和下岗失业青年等”^[6]。第三，非公有制经



济大发展直接为青年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 1996-2005 年期间，“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部门的就业的确是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 696 万人，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港澳台商、外商投资等新兴所有制形式的部门，以每年平均 298 万人的速度为城镇提供就业机会；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则以每年 391 万人的速度增加”^[7]。

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写进执政党的政治报告、载入国家宪法，从而获得长足发展，意味着青年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成为中国青年代际转换的关键支点。就业、创业对于青年具有特殊的人生意义，就业、创业环境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他们人生境遇的重大改变，将迎来不一样的个人命运。比如，从 2000 年起大学毕业生进入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比例在经济发达地区就超过了半数^[8]，而几年前他们还是由国家包办就业的；数以亿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从业，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带来的一大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还体现在，使广大青年的就业观念、成才观念、学习观念发生重大嬗变，使广大青年的人生选择机会、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更加多样化，由此也必然在更深层面上使他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发生变化。

4. 加入 WTO 的效应

2001 年 11 月 10 日，我国终于成为 WTO 新成员。就加入 WTO 的结果及其影响来看，它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国家的现代化意义要远大于其单纯的经济意义，所以，加入 WTO 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大转折或新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已不可逆转，发展市场经济的取向已不可逆转，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相应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要和世界经济相适应，从而必然推动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国将全面融入世界，国民将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与世界发生广泛的交流，并受到更剧烈的观念冲击，将因为国家经济上的成就在世人面前获得更大的民族自信心，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意味着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将具有世界意义，他们将自觉不自觉地接受 WTO 这一“世界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新的国际文化关系准则”^[9]，从而也被卷入全球化浪潮。

很显然，加入 WTO 更使得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着崭新的人生境遇。出国留学、出国务工、出国创业、

出境旅游都更加便捷了，于是留学大潮、出国务工潮、出境旅游潮立即汹涌而至，大批青年由此获得了直接置身于异域文化之中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亲历对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机会。随着中国加入 WTO，本土的外向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外来投资踊跃而至，商业往来遍布全球，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更多的国外留学生进入中国的大学教室，于是中国青年不仅获得了大量就业谋生的机会、个人发展的机会，一些青年虽然未出国门，却有了自己的“洋同事”、“洋工友”、“洋同学”，走上了参与国际经贸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的第一线。总之，随着中国加入 WTO，大批青年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拥有了大不一样的生活，而且获得了多重的人生收获。

三、催生第六代青年的公共政策

如果说上述四个标志世代特征、社会属性的宏观性、背景性因素对第六代青年的诞生发挥了蕴育、涵养作用的话，那么以下两种因素，则对第六代青年的诞生发挥了更直接、更具体的“催生”作用。

1.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应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的观念和心理造成巨大冲击，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为此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震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家长的育儿观念。城市中的新生儿都成了独生子女，即使在农村，虽然独生子女女并不多，但新生儿绝大多数也属于“独生子女家庭”。从那时起，孩子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迅即变得异常金贵，“孩子最重要”、“再苦不能苦孩子”成为新流行的社会心理，“孩子中心主义”成为普遍的行为模式。

所以，第六代青年作为“被计划出生”的一代，成长的家庭环境必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在改革开放之后，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改善与家长养育子女数大幅减少的双重因素之下，他们得到比其前辈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第二，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使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更多。第三，子女得到家长的情感关怀、生活照料更多。第四，子女受到娇惯、溺爱的可能性大幅上升。第五，在家庭小型化以及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子女家务劳动锻炼机会明显减少。

可见，第六代青年与第五代青年相比，幼年时期



面对的家庭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穷养”到“富养”的变化；多兄弟姐妹相伴成长到少或无兄弟姐妹相伴成长的变化；家长关爱少到家长关爱多的变化；家庭责任多到家庭责任少的变化；家务锻炼多到家务锻炼少的变化等等。这些家庭因素对于孩子身心的成长发育都是基础性、关键性的变量，这意味着第六代青年在人格特征上与第五代青年相比必然发生重要变化。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生活观念的增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观念的弱化，唯我独尊、自我中心人际观的增强，尊重他人、关心他人观念的弱化；拈轻怕重、懒惰贪玩意识的增强，不怕挫折、吃苦耐劳意识的弱化；依赖意识、自怜意识的增强，自立意识、责任意识的弱化等等。

2.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效应

教育部 1998-2008 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9 年中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至 2003 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即突破千万，由 1998 年的 341 万人增加到 1108 万人，一举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至 2008 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又突破 2000 万，达到 2021 万人。对于高等学校的超大幅度扩招，尽管争议颇多，但对于当代青年的意义是超乎寻常的。第一，使更多的中国青年进入了高等学校，以更直接、更便捷的方式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在人生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机会和主动性。第二，使更多的农村青年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很坚固的背景下，从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这种流动远远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它包含着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事实上，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旦进入高等学校，一般都会获得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毕业后大多数都能走出农村，留在城市获取一份有相对较高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的职业，有的甚至还能够逐渐步入社会领导阶层”^[10]。第三，它使更多的青年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源，并以独特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四，它使更多的高学历青年进入相对落后地区、偏远地区工作，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第五，大幅度提高了中国青年人口的素质，优化了其文化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等等。

高校大扩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走出了精英教育时代，这对青年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必然产生强烈的冲击。他们不仅丢失了“天之骄子”的称号，更重要的是还基本丧失了精英意识。于是“以天下为己任”

的责任意识、“舍我其谁”的豪迈精神悄然式微；相对于同龄人的优越感、自豪感只有在名牌大学才能找到；更多的大学生不再像其师兄、师姐们当年那样关注国际时局、国家大事，而转向了关注自我的小天地；在越来越残酷的就业竞争中，他们还深刻体验到了无奈感、无助感、边缘感和失落感。当然，他们也摆脱了作为“天之骄子”的骄娇二气，更像一名“普通”青年了。总之，精英意识的强弱，成为第六代青年中的大学生与其前辈最深刻、最显著的差异。

四、结 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加入 WTO 以及高等学校的大幅扩招，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可以说除了基本的社会制度之外，中国的一切都呈现出全新面貌。同时，上述五大因素对当代青年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更深刻、更切实的意义，也必然使其处于全新的社会关系之中。于是与上一代青年相比，其人生境遇和精神光谱势必呈现出全新的样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明显转变，从而成为全新的一代人。这就是中国青年代际转换、第六代青年出世的必然性所在。

作为生活在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处在“现代化门槛上的一代”，第六代青年的人生历程与前辈青年相比所面临的矛盾是独特的——物质保障最充分，但面临的竞争最激烈；文化层次最高，但终身学习的迫切性最大；面临的机遇最广泛，但选择过程的困惑最多样；思想视野最具全球性，但思想解放的任务最繁难；接触西方文化最多，但“洋为中用”的使命最艰巨；精神食粮最丰富，但精神光谱最复杂。

按照党的十八大的战略部署，到 2020 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届时，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这意味着我国将进入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的最

（下转第 15 页）

段,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此时的中国青年所面临的社会关系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又将迎来一次世代更替,第六代青年会庄严谢幕,第七代青年作为“迎接现代化的一代”将赫然诞生。

袁贵礼 :淮海工学院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 汪永涛

参考文献:

-
- [1]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M].东方出版社,1988.9.
 - [2]孙宏艳.新媒体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14(02).
 - [3]江泽民.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http://www.qstheory.cn/dj/djzl/lcddh/201210/t20121001_184666.htm,1997.
 - [4][7]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07).
 - [5]姜彦福.全球创业观察2003中国及全球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1.
 - [6]安国启,邓希泉.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85.
 - [8]谢文模,俞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论略[J].中国大学生就业[J].2003(08).
 - [9]兆木.全球化背景下WYO的文化意义探析[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05).
 - [10]唐慧君,彭拥军.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J].大学教育科学,2007(01).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